

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

民族复兴 与中国共产党

朱育和◎著

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内外因缘,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及其价值,揭示其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融通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人民出版社

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重点出版物

民族复兴 与中国共产党

朱育和◎著

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内外因缘,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及其价值,揭示其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融通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孟 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朱育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01-013937-1

I. ①民… II. ①朱…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学习参考资料②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616②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516 号

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

MINZUFUXING YU ZHONGGUOGONGCHANDANG

朱育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9

ISBN 978-7-01-013937-1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代 序

重新认识祖宗,重新认识自己

——一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五十多年的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历程

我在清华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五十多年了,写过一些论文,十年以前还编著了《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但是,现在看来,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的熏陶,当时写的东西,包括那本书在内,问题不少。现在回想起中间转变的历程,不仅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思想总结,对当代中国像我一样关心中华民族复兴的人来说,也许不无参考价值。

一

抗战初我生于上海,曾饱尝殖民统治和内战的苦难。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好,我好;共产党犯错误,我也跟着倒霉。前30年,基本上是在阶级斗争中度过。“文化大革命”中我戴过高帽、游过街,不仅精神紧张,而且经济上极度贫困。改革开放后的30年,国家政治上稳定,经济大发展,我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提高。自己做梦也没想到,60岁以后还能开上汽车。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前夕,为了更深切地感受国家的进步,我决定和老伴一起,驾车从北京到深圳、上海,再返京,走了5400多公里。从北京到深圳,我们走的是京九线。赣南粤北,地势复杂,高山林立,高速公路穿山而过,最长的隧道达5公里。从深圳到上海,沿着海边的高速路,有许多的跨海桥,其中有世界最长的杭州湾大桥,全长36公里。一个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能够驾车开在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八车

道宽的跨海大桥上,感到非常自豪。沿途经过的所有城镇,没有一个不在发展之中,这一切使我感慨万千。毫无疑问,这些奇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谈国家进步,就不能不谈共产党的作用。我们的党从小到大,历经磨难,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如果聚集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只要这个党不出问题,只要党的领导不断得到改善和加强,只要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一路上我们陶醉在这种喜悦之中,但是另一种埋藏心里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1960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了解中国由康乾盛世急速转为衰世的悲惨历程,也深知国家由衰转盛难,但由盛转衰易。

在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中国成就很早,很发达,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就落伍了。面对信奉排他性宗教、以“狼文化”(优胜劣败)著称、又抢到了现代化先机的西方列强面前,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中国衰败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拜西方人为师,以洋为镜,想寻找一条自强救国之路,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国家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

九十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出现过数百个所谓的政党,也模仿西方,多次举行过议会选举,但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核心,写不成一个“中”字,中国不像中国,被人称之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那时的中国,国家坏到了极点,民族危机到了极点,人民痛苦到了极点,五四爱国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一个战胜国所受的待遇,居然还不如一个战败国。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为救亡而奔走呼喊。五四运动以及在它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物质的基础。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五十多人,但是它的主张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因此逐步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中心。经过九十多年的奋斗,在中华民族政治复兴、经济复兴和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中华民族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的“中”字就这样有力地写出来了。只要共产党这面旗帜一发号令,全国人民立即动员,一致行动,惊天地,泣鬼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今天的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摆脱了过去的苦难,成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有尊严的大国,并正向一个有希望的强国迈步。对此,本人是有切身感受的。

现在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也确实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我已经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多年了,还能再为国家干10多年,这10多年就做一件事:保护好这个党,为改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让飘扬的红旗不倒。

一
二

1979年,坚决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这表示了美国上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他们以为,只要中国在经济上走西方的路,这就是“和平演变”的“好”的开端。经过十年,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大“风波”,这是美国意料中的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欣喜若狂,一致断定,中共必定垮台,这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崩裂的第一个突破口。没想到,“风波”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没有动摇,红旗还在飘扬。这在西方国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西方话语中,是中共“一党专制”。中国被西方国家列入“专制国家”的行列。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认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共产党“一党专制”居然还能搞资本主义,而且还是高效率、高速度,比他们搞得还要“好”。此时,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眼中不仅成了“威胁”,而且还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八九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但不敢动用武力。美国闭眼一想,不敢再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手”,再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只能在高科技出口、武器出口等方面做文章,制裁中国。这同样无济于事,中国还是在迅猛向前发展。他们开始意识到,光靠经济手段,要搞垮中共,达到和平演变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把战略中心从欧洲转到亚洲,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威胁中国,同时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施放“西方民主”的“精神原子弹”。这种“原子弹”在中国台湾已经引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即将发生作用。美国在台湾、香港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仅仅针对台湾和香港,而是瞄准了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这面旗帜。在美国心目中,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垮台,中国政治就多元化,就向西方靠拢了。

美国的经济制裁、军事包围和威胁是不可能打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的“民主原子弹”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内部相当一些人天真地认为这是一颗“糖弹”、“宝贝”,中国只有向美式民主靠拢,开放党禁,搞多党制,一人一票,就能杜绝腐败、缩小两极分化,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对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做出明确的回答,否则,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

三

面对美国的“民主原子弹”,在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是心虚,底气不足。我长期认为,中国自老祖宗开始就是“专制”“独裁”的。这是天经地义的“公理”。这个结论无需再加论证,已经浸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但是,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恰恰是大一统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因此,在西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是一党专政面前,感到无法加以有力驳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非常困惑,有时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步伐,向西方靠拢,寻找出路。但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凡是实行“美式民主”的,几乎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又觉得很可怕,觉得此路不通。此时,自己好像跌进了一个闷葫芦里,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出路,心里非常迷茫,非常痛苦。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全国高等院校将“中共党史”课程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带头人之一,不久又将“中国革命史”改成“中国革命史通论”。后来又找到民族复兴的载体,将这个课改成了“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这样与时俱进的改革,也曾经收到一定效果。但现在看来,还是表皮的,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西方话语的控制,在西方挑衅面前,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思想一交锋,就败下阵来。我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讲北大“三兔”(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从西方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抨击中国“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讲得越生动,越形象,收到的效果越相反。有的学生说,听了课,“民主”欲望空前高涨,要去支持“颜色革命”。我感到很可悲,很无奈。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赴香港出差,在香港知识界有不少朋友。他们和我交谈中,都认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他们问我:中共凭什么执政?我说,共产党是打天下打出来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又问:为什么

长期执政,不选举?我将国内选举状况如实告知。他们说这种选举是假的,因为共产党掌握着军队,又没有反对党,没有多党轮流执政。面对这些问题,我说不清了。

我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容许自己的思想长期处在这种混乱的、麻木不仁的状况。我和我的科研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对自由、民主、专制等问题展开了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自己突然发现,原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结论,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自己中了西方“中国两千年专制”说的毒计,上了他们的当,错把近代以来西人的一些理论假说,当成了实在的史实,误将西方近代特殊的发展模式或非常态的模式,认作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实际上,只要不带先入之见,冷静而客观地考察研究,就不难发现,中国在两千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都是遥遥领先,其落后只不过是19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在此长期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曾经倡导过“自由”^①。而反观西方,自从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特别是476年西

① 一般而言,“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国家通过法律等手段,对个人言论、行为、财产等权利的保障或限制,另一种则是非政治法律层面的自由,即内心精神层面的某种状态,指的是超脱于世俗的束缚、摆脱物欲的羁绊等。古代中国的前一种“自由”比较特殊,历朝历代基本都属于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对社会的管治一般只达到县一级,且主要管治刑罚和赋税,县以下则任民自治,老百姓只要纳完赋税且不犯王法,政府一般就不会干预其生活生产,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思想言论、著述出版、迁徙营业等权利有较充分的保障,与西方古代及中世纪那种教会和贵族专权、人民无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太赞成照搬西方的自由。例如,孙中山认为中国激进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对的”,中国不是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是“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就像“一盘散沙”,“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得到民权……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77、282页)至于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如《论语》中所说的“为仁由己”,《庄子》中所提到的“自得”等,都含有这样的意思。“自由”两字连用,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赵岐注《孟子·公子丑下》“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一句为:“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然舒缓有余裕乎”。东汉末年的《孔雀东南飞》中也有“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到唐代,著名诗人的诗句中经常出现“自由”一词。如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出门无所得,徒步觉自由”;白居易《苦热》:“朝客应烦倦,晨夫更苦辛。始渐当此日,得作自由身”。李商隐《和韩录事送官人入道》:“星使追还不自由”。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等。其中所说的“自由”,都是精神层面的自得自适的状态,完全与政治层面的东西没有关系。

罗马帝国灭亡后,千余年间,教会专制,封建诸侯对内混战,对外兼并、侵略扩张,社会动荡,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正因为如此,西方才会不断有人出来反专制、倡“自由”,主张“不自由,毋宁死”。经过多次改革,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国家的民权自由才稍微像点样子,但即使到了那时,国家大权还是完全操纵在贵族、资本家手中,下层民众无从过问,而且奴隶制度还合法地、大规模地存在着。没有人倡导“自由”,并不等于“专制”;大声疾呼“自由”的人多,也不能证明“自由”,反而从反面证明了没有自由,原因很简单,只有专制盛行、没有自由,人们才会感到需要自由,才会不断要求自由。但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西方各国率先进入蒸汽时代,新的生产力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财富的暴涨与集聚,人的物质生产有了很大的改善,西方由此便一俊遮百丑,倒回去编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从来就是先进的、自由的,同时,为了保证独享其利,极力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打压非西方国家,把他们说成是从来就是专制的、落后的。但是,无论西方如何制造并试图垄断话语霸权,都难以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直到今天为止,西方国家在世界上领先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才两三百年——这对于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而言,不能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能有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还得感谢马克思对它的批判,让它们开始搞福利社会,从原始积累阶段过渡到现代资本阶段。

当自己从闷葫芦里转出来以后,我感到庆幸,也感到非常可怕,因为像我这样认识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有人从闷葫芦里探出头来,对老祖宗说几句肯定的话,对“自由”、“民主”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就会遭到众人围攻,就会被无数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把他重新摁回到闷葫芦里。这种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摆脱西方的话语控制,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已经得到的辉煌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我已步入古稀之年。按常理,人越来越固执,不容易转变。但是,在话语权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既然知道过去自己错了,就要坚决把它纠正过来。此时,我发现自己有很大的动力,我开始能够说中国人自己的话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充满了活力。我有信心,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发展道路解读清楚。

四

今天的中国人在评论中国历史时,动辄喜欢用“中国两千年专制”、“中国三千年专制”、“中国数千年专制”来做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不光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专制”的,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也都是“专制”的;不光中国政治是“专制”的、中国经济是专制的,而且中国文化也是“专制”的。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孔子、孟子等都成了“专制圣人”、“专制文化”的代表。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吗?

“中国”是我们这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名称。在现代汉语里,“中”字意思很多,但考察其起源,我们却发现,其最初的含义,指的是处于核心地位者为召集诸侯、诸部落会盟而竖起的旗帜。唯其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国,要维持秩序,维护统一,造福天下苍生,必须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其他一切便无从谈起。



甲骨文和出土金文中的“中”字的几种写法

自秦统一中国至今的两千多年里,在常态情况下,“中”字中间一根旗杆,象征着在这片统一的辽阔的大地上,只有一个凝聚核心,只有一面旗子指挥。全国百姓在一个自己拥戴的执政集团的指挥下,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当这个执政集团争权夺利、昏庸腐败、暴政横行时,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多根旗杆,多个核心,此时就进入了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战乱越激烈,混乱的时期越长,付出的代价越大,百姓企盼和平稳定的心情就越殷切,其后的和谐稳定时期就越长久。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中国过去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有野心者觊觎皇帝之位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动荡和战乱,皇帝被说成“天子”,像“老天”一样

神圣,代表“老天”管理天下,同时,皇帝之位世袭,且有严格的继位规定,一般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皇位。通过世袭而继承皇位虽然具有“防争”的好处,但这样继任的皇帝不一定都贤明,不一定都有杰出才能,有的甚至很小就做了皇帝,为了弥补其不足,同时又设宰相和文武百官,具体负责处理国家政事。宰相之位和百官之职不世袭,而是通过特定的制度,通过推举、考试等方式选拔产生,是一种“传贤”之制。同时,由于中国自古就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为防止各地方诸侯相互争斗或割地自据,秦以后废封建,实行中央集权制,在皇帝和宰相的共同领导下,中央各部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深知马背上打来的天下,来之不易,因此,一旦坐了江山,就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们深知,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民惟邦本,本固才能邦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家的好坏,社会的安定和谐,最主要的是要老百姓满意。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统一之后,在重大事情上一般都注重听取不同意见,不敢妄加决断,更不敢独裁专制。从秦朝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实行“廷议”制度。这种制度后来不断发展变化,到明朝时已经相当完善,国家遇有重大事件,内阁和中央政府主要部委官员讨论并投票表决、皇帝“批红”决策、部院执行;对于廷议过程中大臣们投票形成的决议,皇帝虽可以发回再议,但一旦决议形成,则一般情况下都应按照大臣们投票表决的结果执行。正因为如此,皇帝可以不必直接过问政事,有的甚至20年不上朝,而国家机构照常运转。^①统治者们都大都强调奉公守法,任何官员的违法违规之举,都会受到严厉制裁。而“专制”一词在古代中国主要用来指称官员的违法、专断行为。例如,司马迁所说的秦昭王之母“宣太后专制”、西汉吕后“立诸吕为王,擅权专制”^②。《旧唐书》所记载的东汉末曹操、司马懿“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③。《宋史》中记载的唐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失去控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明朝十六帝》,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试论穆宗大阅与掩答封贡》,《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试论明代的科道官》,《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限制》,《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② 司马迁:《史记》,卷72《穰侯列传》及卷40《吕后本纪》。

③ 《旧唐书》,卷21《礼仪志》。

制,“藩镇专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据”。^① 这些指的都是官员、皇亲国戚及地方大员不守法度、专擅跋扈。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一处“专制”是用来指皇帝或整个制度的。皇帝即“专制”,即“独裁”,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说。

“专制”的意义发生变化并用来指称皇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清朝统治者面对危机,腐败无能,争权夺利,对外投降,对内压迫,致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爱国的先进分子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们挺身而出,以西方为师,开始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大声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接受西方人炮制的“中国两千年专制”说。

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开始把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定性为“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②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批评老祖宗是专制独裁方面,大大超过康有为。在他的笔下,“专制”渐成为对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一般特征的概括,中国也成了“专制最久”的国家^③,“我国数千年,为君主专制国”^④。他甚至说,中国数千年来,万事万物无一进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专制政治”^⑤。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主张上完全站在康、梁的对立面,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论战,但是,在对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评判上,两派却是惊人地一致。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⑥,“中国人受专制之祸二千余年”^⑦,“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⑧

更富戏剧性的是,清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开始用“专制”一词来为自己

① 脱脱等撰:《宋史》,卷478,《世家——南唐李氏》。

②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③ 《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190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98页。

④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十六,第45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60、64页。

⑥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5页。

⑦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88页。

⑧ 《民报》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本,第8页。

的政治体制定位。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端方,向光绪皇帝奏报说:“百年以前之欧美诸邦及二十年前之日本,则其政体亦皆为专制政体,与我同也。”“观于我国,数十年来之未臻富强,而外交之事无不失败者,亦与俄国有同一之理由。专制政体之国,万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另外一位考察政治大臣、清朝皇室要员载泽也通过密折向光绪报告说,“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①慈禧太后对他们上奏中的“我朝专制”这样的说法表示认可,下决心搞预备立宪,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康、梁、孙乃至清政府的高级官员这样使用“专制”一词,显然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专制”的这一新义是从西文 Despotism 等词翻译而来(有的道经日本,有的直接从欧洲翻译)。但是,查一查西方的记载,就知道 Despotism 一词在西文中正式出现很晚,直到 1727 年才正式有记录。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该词往往含有以下四种含义:1. 天生为奴(奴隶制);2. 人无私产,产归王有;3. 国王手握臣民生死大权;4. 没有法律,唯王意是从。就从他们的定义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哪一条都沾不上边,倒是美国、英国等实行奴隶制度的西方国家曾经是标准的“专制”国家。可笑的是,他们却把“专制”一词反扣在中国老祖宗头上。

下面列举一些史料,看他们是怎样通过名人名家一步步把中国抹黑为“两千年专制”国家的:

对“专制”一词的定型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第一位重量级的大思想家是法国人孟德斯鸠(1689—1755)。他在所著的《法意》中说:“一言以蔽之: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②

1793 年率英国使团来华访问的马戛尔尼回国后所写的见闻录等文稿中,多处把中国描绘成“专制”国家,内部实行的是“专制制度”。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等人在其报告中,也多次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述为“专制制度”,说中国“当皇帝的首要准则是少在臣民面前

①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页。

② 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80 页。

出现”,“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等等。^①

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政治制度时说:东方人不知道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在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专制君主”。他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②不自由的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③

1859年,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出版。在书中,穆勒极力证明,是“专制”造成了东方社会的不自由、不进步,中国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员”,“支那之宰相,与田野之佣民,皆奴才也。”^④

以上诸人有关“中国专制”的说法,在欧美造成普遍、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专制”说在那里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融化到各个学科之中。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夏尔尼、穆勒等人的著作和思想陆续经过留欧学生翻译介绍到中国,或经过传教士传播到中国,或转道日本,经过留日学生翻译引进到中国,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他们的著作一译再译,在中国大地泛滥。

由西方大师丑化中国老祖宗的“理论”,再经过中国大师替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其威力是很大的。晚清民初接过西方学说的代表人物,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严复),有的是政治思想大师(如康有为、梁启超),还有的则是革命党的领袖(如孙中山)。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学子顶礼膜拜的爱国主义者、理论导师、思想偶像。这就使得这些学说的影响力空前扩大,深入人心。同时,随着晚清科举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这些谬说被写入大中小学生必读的课本,变成了课堂教学的内容。这样,经过百余年的熏陶,它们就自然成为人人熟悉、天经地义的“公理”、“定理”,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两千年专制”不是从中国开始,更不是从两千年前的中国开始,而是从近代西方开始的一种谬说。它是近代西方丑化中国历史

① [英]约翰·巴罗著,李国庆、欧阳少春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0、261、262、264页。

②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页。

③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6、117、119页。

④ [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7—118页。

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产物。这些谬说,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或许还没有大碍,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政治实践。从晚清预备立宪开始,中国就在尝试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更是采用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实行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但反复不断试验的结果,国家的情况一点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成了“兵国”、“匪国”。爱国的先进分子在绝望中被迫放弃旧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另寻新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改组的。最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人民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老祖宗数千年的智慧,同时也吸收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没有皇帝,更没有终身制、世袭制,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通过选举产生。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在共产党之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样的民主,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能够充分表达中国的民意。但是,“两千年专制”说像幽灵一样仍然阴魂不散,盘旋在中国上空,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使出一切招数,试图毁坏中国的凝聚核心和人民民主制度。因此,不从根本上弄清其真相,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揭示“中国两千年专制”说是近代西方制造的一种谬说,是对中国历史的扭曲,与中国历史真相完全不相符合,并不是怀念帝制,认为皇帝制度好,更不是要主张回到帝制。历史早已证明,在近代世界潮流面前,皇帝制度已经落伍,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继续前进的绊脚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共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形成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发展速度之快,效果之明显,世所公认。相对于晚清时期的帝制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五

在西方世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与此不同,

绝大多数人是非宗教的,相信现世,尊重祖先,因此,历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它是中国文化中的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以及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教训。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是昨天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也将是明天的历史。割断了历史,离开了历史,今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就成了没有父母的“石猴”,没有祖先的“野种”。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向来重视历史,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连续时间最长、体系最完备、记录相对可靠的正史体系——二十四史。同时,古人对于历史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有着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因此,要治国理政,必须“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②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③不能设想,一个对过去的历史没有正确而深刻认识的民族,会妥善地把握现在,合理规划未来。

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主体是此时此地的中国人。认识历史不是为了过去的古人,而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说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④,所指的正是这一问题。我们今天肩负着的,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动地继承过去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评估传统的历史文化,并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

历史分为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前者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实际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后者则是由人撰写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由于撰写者的文化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动机不同,后一种历史的主观性有时如此明显,以至于甚至会出现所描述的对象与真实的对象完全不同的现象。中国历史在近代所遭遇的,正是这样的命运。

① 《古史钩沉论二》。

② 《尊史》。

③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1999年4月25日),《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④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实行“兵战”,从军事上打败被侵略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领土,索要赔款,取得各种特权;又实行“商战”,从经济上掠夺、剥削落后国家;而且还有计划地实施“学战”,从思想理论和精神层面打压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按照西方的意志,任意“改造”甚至否定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们把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印度等说成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如果说有历史,那么也是处在进化阶梯上最“原始”的阶段,属于“野蛮”社会或“传统”社会的阶段;如果说其后还有历史的话,那也是一部“数千年专制”的历史。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想走出原始的野蛮社会,向着近代文明社会发展,就必须告别老祖宗,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前两种战争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金融命脉被列强所控制,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后一种战争则使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丧失了话语权,历史文化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精神上长期处于一种十分痛苦和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积极谋求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则又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说教,去猛烈攻击、批判乃至抛弃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把挽救民族危亡和重建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学习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上。中国古代悠久而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就这样被打入了另册。从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各大学习惯于直接使用国外原版书籍或其译本作为教材。偶有学校自编教材,所用理论框架也基本上是西方的,从中国文献中所取用的只是一些材料而已。毛泽东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①

这种情况发生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也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显然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道理很简单,一个只有GDP增长而没有学术文化自觉和自信、没有学术文化独立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伟大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